

关于匈牙利何时引入欧元这一困境的思考*

戈特夫里德·彼得

匈牙利在加入欧盟的条约中对于引入欧元的没有做出约束性的期限。所以问题不在于是否引入欧元，而是何时以及在决定引入中会有哪些条件。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欧元体系的能够应对危机，但同时也表明仅靠欧元并不能保证可持续的趋同。不仅是加入本身，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还尚未终结。非欧元区的成功经济政策和欧元区增长陷入僵局都有实例。其是一个可以确定的方面是，成员资格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回报的差异。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其重要性远不及以往，但事实就是如此，不知会持续多久。因此，匈牙利战略的目标不应该是引入欧元，而是可持续趋同。如果我们能够以一定的程度扭转政府赤字和债务并将其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那么为了战略目标，等待欧元的发展方向并迎头赶上是值得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机会不存在，则值得选择尽快加入欧元区，提供更大的安全性，但自主操作的回旋余地更小的选项。

经济文献杂志（JEL）编码：E58、F36、F42、F45、H63、N14、N24、N44、N90、N94、O40、O52、O57、P43

关键词：欧盟；欧元区；欧洲货币联盟；欧元；欧洲一体化

一、引言

在加入欧盟的条约中¹，匈牙利承诺为加入欧元创造条件，并将在适当的时机开始实行欧元。自2002年谈判结束起，到2022年这一承诺2022年已经二十周年，

因此，法律情况是明确的。近年来，匈牙利公众舆论也悄然意识到加入欧元区的时机问题。根据民意调查²，匈牙利公众舆论普遍对在某个时候引入欧元持积极态度。政府也认为，这会在适当的情况下发生。与此同时，在未来决策中重要的条件和参数方面似乎没有“具体化”，其中包括在哪个期间

*所发表文章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匈牙利国家银行的官方主张。

戈特夫里德·彼得（Gottfried Péter），匈牙利国家银行货币委员会委员。电子邮箱：gottfriedp@mnbb.hu

本文原文发表在《金融与经济评论》杂志2021年9月号“我们的愿景”部分。<http://doi.org/10.33893/FER.20.3.110126>

¹由匈牙利2004年第30号法律公布，2004年5月1日生效。谈判于2002年12月与哥本哈根欧洲理事会相关的政府间会议结束。

²参见“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2019年10月的调查报告，根据该报告，66%的匈牙利受访者对欧元持积极态度。<https://www.gesis.org/en/eurobarometer-data-service/survey-series/standard-special-eb/study-overview/eurobarometer-922-za7580-october-2019>

值得考虑匈牙利加入欧元。因此，目前的问题不是欧元是否会成为匈牙利货币，而是在什么情况下以及在什么时间段内值得考虑。

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也曾经有过确定了具体目标日期的时候。在最初的十年中，其作为“神秘的欲望对象”曾不止一次被提及，然后经过多次被迫推迟后，公共话语中就有了诸如“我们离欧元总是还有五年”的说法。在第二个十年中，我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鉴于全球经济危机后的欧元区危机，加入欧元区成为更加权衡判断的一个对象。对于专业的和政治的舆论来说，问题不在于我们什么时候“值得”加入，而是“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是，那么什么时候才有好处。

直到最近，认为单一货币本身不能被鉴定为对已经加入或者准备加入的成员国有利或不利的观点还没有引发实质性辩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的足够的竞争力可以通过其至85-90%的指数（现在约为73%）来捕获，这种方法也没有引起任何严重的专业反对意见。这一论点背后的经验表明，仓促的、政治胁迫的加入迟早会导致问题，首先是新加入者，不久之后甚至还有其内部合作伙伴。我们希望通过加入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额外的资源，而不是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欧元区的合作伙伴没有强迫那些仍在外面的国家加入。（除了一些过渡性行动，例如当容克委员会在2020-2027年预算草案中将其技术援助的想法作为“不可抗拒的提议”时。显然，新进入者有责任提供加入条件并采取法律主动，如果区内国家认为满足条件，则会接受它。）

因此，在焦点上稍作修改：我不是在考虑我们何时以及如何能够采用欧元，而我想强调一些注意事项：

- 已经引入欧元和整个体系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
- 这一体制可能有哪些发展方向、
- 而这一切又会导致匈牙利加入欧元的时机如何。

我的目标是提出一些与匈牙利观点相关的未来问题。我只涉及过去和现在，只要我认为在假设趋势上它们对未来很重要。目标不是对过去的决定进行限定，而是为一个有根据的愿景做出贡献。

二、变化与稳定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发生了很多变化——自欧元概念诞生后的三年里。这些变化至少在三个方面是显著的。

一、单一货币区的经济和理论框架发生了变化³。仅考虑自2008-2009年危机后欧元区危机的经济政策管理和当前的疫情危机管理以来发生的惊人快速转变就足够了。当然，危机的性质不同，主权-银行-企业债务恶性三角的性质不同，经济政策重点也发生了明显变化。想想之前危机管理的主角，“三驾马车”成员国，今天更担心世界过早恢复正常的言论就行了。就是从现在特点为量化宽松、暂停赤字和债务规则、放松国家援助规则的世界。

³ 自九十年代以来就有人写过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参见例如波尔多与约农（Bordo - Jonung）（1997）

这与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方案试图通过预算削减平衡来引导陷入困境的国家时的声音有何不同⁴。

二、区内形势发生变化。最初的乐观情绪被一个事实所掩盖，虽然该系统被证明是可以抵御危机的，但它未能在主要目标上取得成果。欧盟和欧元区在世界经济和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下降趋势并未停止，区内趋同尚未实现（参见例如Bongard等，2013）。不仅新进入者的，创始国的经历也不同。区内贸易和国际收支顺差逆差重新出现的结构性原因未能解决，导致欧洲南部和西北地区人均差距缩小，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是如此。由此产生的政治胁迫导致胁迫性妥协和胁迫性解决方案，例如，一次性计划的联合债务。总的来说，责任承担及分散使成员国聚集一个阵营中，他们之间的紧张局势是持久的（Acocella，2020）。

三、尚未引进欧元的欧盟成员国的观点也发生了变化。英国脱欧正在严重削弱这组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引进欧元的国家集团在欧盟拥有足够的投票权来决定绝大多数问题，即使是那些与欧元无关的问题。与此同时，欧盟27国在大多数实体经济指标——增长、就业、均衡——方面的表现平均好于该地区。因此，如果没有审慎地权衡利弊，就没有特别的声望价值。这份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可能基于其他人的经验，但有很多因素，谨慎对待它们并考虑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是合适的⁵。

因此，虽然变化很大，但地缘政治考虑在很大程度上是稳定的。加入欧盟和北约确保了匈牙利的地缘政治方向和与同盟体系的联系。也由此可知，加入欧元也不会改变这一点。

毫无疑问，在某个特定时刻，最优秀的民选领导人会根据最优秀的专业人士的建议做出他们认为最好的决定。目的只能是为在新条件下服务于这一点的话语做出贡献。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无论在内在外，欧元区的成功符合匈牙利的利益。即使作为一个非欧元区国家，我们与这一地区的贸易和经济一体化程度也是最高的之一，即高于区内的大多数国家。因此，可能值得坚持的是，我们较少参与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们支持欧元区成功，因为这也符合我们的基本利益。但值得积极形成和表达对未来问题的意见。为此，我要试图揭开一些政治、地缘战略、一体化政策和经济问题，然后从中得出某种结论。

三、欧元区的发展情况如何？ 政治、地缘战略和欧洲政策考虑

创造一种共同货币也许是迄今为止欧洲一体化的最大成就。正如欧洲一体化本身就是通过经济手段实施的政治工程，欧元也是如此。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政治和历史的特点是寻求平衡。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决定是二战后深刻的政治思想的产物，对平衡搜索给予了答案：欧洲列强之间的某种平衡似乎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但后来总是被打破。平衡状态是和平时期，破坏平衡和寻求新的平衡则在欧洲导致了战争。“开国元勋”的意图是，当时构成军事工业基础的国家权力，如煤炭和钢铁工业，应由参

⁴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于2021年3月11日欧洲央行理事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⁵ 欧盟统计局年度国民经济核算（Eurostat annual national accounts）。

与国，特别是德国和法国共同行使。由此，通过蒙坦联盟的建立，他们将限制建立可以相互对抗的能力的能力。（让我们先不管这个今天已经很难澄清的问题，这个想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的鼓励。）有限的关税同盟的成立、配额和其他经济手段由此产生了政治目的。

同样，创建欧元的想法也是基于政治考虑。铁幕的落下、德国统一的现实前景以及欧洲统一稍远前景再次引发了欧洲的均势问题。尤其是法国担心新形势是否会导致德国的优势威胁到既定的稳定，并预计德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存在会加强。他们想要得到保证，这不会导致平衡被打破。在这个政治目标的服务和条件下，共同货币被设置像是葡萄酒桶上的钢带，即使在新情况下，它也确保了不可分割的凝聚力，至少在德法关系中。

虽然是一个没有采用欧元的国家，但英国脱欧在几个层面上带来了欧洲政治权力的重要变化，其程度现在还无法准确衡量。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七国集团成员国以及核大国的脱离，不仅会大大降低欧盟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而且还会影响欧洲内部的力量平衡。除了直接影响之外，由于迄今为止经济哲学之间存在的平衡发生了变化，间接后果对我们来说可能更为重要。面对陆地的法国和德国不担心国家参与限制或至少规范竞争的想法，由荷兰、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和维谢格拉德集团⁶、以英国为首的支持自由贸易关系以尽可能保持自由竞争和有限的国家干预这些所组成的集团是一个平衡因素。荷兰领导的所谓汉萨集团正在尝试，但德法南欧集团之间的和谐和影响似乎正在强劲增长。同时，在防范和分担金融风险的适当程度、团结的方式和程度等问题上，需要进行艰难的取舍。

四、欧元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

当前欧元区结构的构建是不完整的。尽管事实证明它比许多人想象的更有弹性，经受住了债务危机，并且似乎很好地度过了疫情的风暴，但普遍的看法是，在目前的准备阶段，在此程度上该结构不能长期可持续地稳定发展，它必须向前或后退。然而，这两个方向都不容易移动（Erhart, 2021）。退后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政治和物质损失。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名言“不惜一切代价”显示了它的规模⁷，或者到目前为止大约2800亿欧元用于对希腊的各种救援计划。仍然显现的是，尽管存在欧元区解体的预期，但无论是成员国还是过度国家，都没有解除这一体系的政策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过来需要向前推进以稳定欧元架构。但它既不简单也不是没有矛盾的。近年来采取了重大措施来帮助管理危机，而不必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实现质的飞跃，即风险预防和风险分散的新比例。因此，一个（我们称之为西北派）指的是承担自我责任，另一个（比如地中海派）指的是团结。与不变的前线一起创建的许多工具和机构已经被创建。除了共同存款保险计划外，银行业联盟已经建立，欧洲稳定机制（ESM）也已经建立甚至扩展，从而形成了一个精制的安全网体系。然而，就目前而言，跨越这条红线走向财政联盟的尝试

⁶ 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捷克、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

⁷ 马里奥·德拉吉于2012年7月26日在伦敦举行的全球投资会议上的讲话。

已经连续失败。由于未来的困境，而且由于匈牙利的间接参与，重要的是，在欧盟 27 国预算内为欧元区成员创建一个不是很大的、主要是原则上划界的部分的计划也失败了。这已被欧盟 27 国范围内的重建基金（Reconstruction Fund）所取代⁸。

在此方面，欧洲重建基金⁹的结构体值得特别关注。一方面，对于债务或债务的未来部分而言，经过长期的“吝啬”抵抗后，发行联合债券（当委员会在市场上充当借款人并且担保是由成员国共同提供）。另一方面，采取行动的条件是成员国和机构承诺这是一次性案例，不会为未来树立先例。考虑到即使没有疫情，争论也很激烈，疫情期间国家采取的措施导致预算赤字和主权债务大幅增加，在疫情之前是非同寻常的，特殊情况更多是参考，大问题是如何避免联合发债成为经常性甚至永久性资产。

前面提到的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例如从匈牙利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特殊的困境。这比“负责人”（降低风险）和“化油器”（主张风险分担）的社区与富人和穷人群体相吻合巧合着并要复杂得多。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在定位方面的作用至少与发展序列的作用一样大。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判断为什么一个国家目前的领导层认为该国未来有更大的机会和重要性的问题。将风险和最终责任分散到尽可能大的社区，这也意味着他对自己的命运承担责任的能力较差，但期望在一起，他会一起做得更好，或者相反，即使更困难，责任更大，让我们在必要的范围内保持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世界观问题。此外，该决定不能或难以纠正。问题不在于如果事情进展不顺利，欧元区成员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离开这一体系。这一制度是由民主法治组成的。他们不会违背自己的意愿强迫或拘留任何人。然而，在与英国脱欧相比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退出将导致比我们预期的更严重的损失。那么，一个草率的决定不能或只能通过巨大损失来纠正并通过一代、两代或更多代来忍受。因此，还有进行彻底、冷静的审议的余地。

五、评估欧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和不符合预期？¹⁰

欧洲一体化及其旗舰产品欧元为稳定做出了贡献。尽管无法阻止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从而阻止欧洲相对权重下降的趋势，但事实证明，它比预期更具对危机的抵抗能力。欧元但至少有一些成员的成员资格已经被埋葬了多少次了！似乎在关键时刻，政治意愿总是被证明是强大的，即使以妥协为代价，但要在危机中让系统渡过难关。但它是否能够促进区域内的融合？

可以从几个角度评估经济趋同。1992 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提出的期望和假设是，随着欧元的引入，成员国将放弃其货币政策自主权，从而通过消除汇率不确定性和降低借贷和过境成本来实现更大的稳定性和经济增长。

⁸ 在为欧洲货币联盟改革而产生的概念中应指出所谓的五主席报告，由欧洲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元集团和欧洲央行的主席（行长）于 2015 年 6 月提出。

⁹ 下一代欧盟是恢复和复原基金的一部分，该基金提供 3600 亿欧元的贷款和 3125 亿欧元的赠款，共向成员国提供总计 6725 亿欧元。

¹⁰ 在本章中，我参考了 Virág (2020) 和 Acocella (2020) 的论文。

在引入欧元的准备阶段，名义趋同的发展得到了特别的关注。预期是区内贸易的商品价格将趋于平稳，通胀将趋同，为追赶成员国的生产率增长留下所有空间，金融纪律规则防止财政政策分权导致无纪律及对其他成员国传播其后果。预算标准已辅以“无救助”规则，以强调财政纪律的严格性和问责制的必然性。

人均收入趋同本身和理论上并不是经济一体化的明确条件，但可能是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和承诺。促进繁荣已被制定为“更加紧密的联合”即更紧密整合的明确目标。欧元创建过程中的主流观点是，汇率风险和壁垒的消除将把资本引向正在追赶中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劳动力正在向工资较高的国家转移。然而，今天的辩论也很重要召回，如果经济资源仍然集中在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已经更好地配备的地区，则存在分歧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结构性和凝聚力政策不仅对于再分配的受益者而且对于整个系统的运作一直并且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迄今为止的趋势不支持欧元的引入将导致收入水平的趋同（Franks等，2018）。即使在核心地区，强大的德国人和低于平均水平的法国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意大利人的收入大约有20年没有增长。值得注意的是，时期可能因国家而异。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引入欧元后的缓慢和哈茨改革之后的快速增长阶段。后来进入者的表现也不是预期收敛效应的明确证据。与较不发达的波罗的海国家令人信服的追赶过程相反，在与欧元区或欧盟27国的购买力平价计算中，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或芬兰的人均GDP没有增加而是有所下降。然而，在欧盟27国内部，维谢格拉德集团有明显的趋势可强劲赶上，其中有的已经赶上了欧洲南部依靠凝聚基金的国家（Tokarski，2019）。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的分析表明，自引入欧元以来，12个创始国的收入趋同与之前的相比已经放缓，然后停止甚至出现分歧。与此同时，2007年及以后加入的国家平均继续趋同，尽管也存在显著差异（Alcidi，2018）。

对于引入欧元的国家来说，收益率优势很明显。这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的意义不大，但这种情况是暂时的，很难估计会持续多久。一个事实表明，尽管欧元区成员国的国家债务大幅增加，但偿债成本从1995年的5%以上下降到1.6%。匈牙利的趋势类似。在疫情前的环境中，偿还约60%的债务所花费的成本超过GDP的4%，而在极端货币宽松时期，大约80%的债务可以以GDP的2%左右的成本融资。

经济结构的趋同原则上不是货币政策成功的先决条件，但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缺乏这一点解释了最近为协调和统一典型的成员国政策而加紧努力，例如福利制度、最低工资设定和社会保障制度。

在显示名义趋同的指标中，通货膨胀率的发展表明，差异的大部分缩小发生在引入欧元之前。到2015年为止，存在相对微不足道但持续存在的差异，相同的成员国一直处于较高的区间（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差异继续恶化它们的竞争力。需要进行单独的调查以确定疫情是否影响了这种情况。在2008-2009年的危机期间，通货膨胀率的趋同并没有继续。

就商业周期的趋同而言，情况并不明朗。根据一些研究，虽然区域内的协调水平高于区域外，但水平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其他研究

表明，一方面，商业周期变得更加协调，另一方面，波动的规模有所增加。因此，虽然周期的协调为单一货币政策的成功提供了更大的机会，但有时最佳放松或收紧的程度因成员国而异。

对欧元的贸易发展和贸易分流效应寄予厚望，部分对外贸易将在区内分流。在这方面，匈牙利的观点有两点：一是欧盟和欧元区在匈牙利出口和进口中的份额如此之高，进一步提高它不是一个合理的目标。[2019年，80.9%的匈牙利出口面向欧盟（匈牙利中央统计局，2020），这是成员国中比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另一个是无论欧元是否引入，贸易集中度正在重新排列。2020年，德国与维谢格拉德国家的对外贸易额高于与中国和俄罗斯贸易总和，约为法国的两倍。2020年匈牙利对德出口达到法国出口一半，超过俄罗斯（欧洲央行，2020）。

六、计划外的变化——尽管有分歧，但团结一致？

检查基于过去经验的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出现并可用于未来可能会很有趣。欧元将成员国分成两个阵营的模式是否属实：反复面临平衡问题的南部地区国家和持续存在国际收支和贸易顺差的西部国家？在这方面，可能存在多种观点。

一是经济、机构制度和社会文化断层线在欧洲并不重合。此外，还有一种重心的转移正在进行中，这将一些欧元区内的流量转移到欧元区-非欧元区，主要是通过动态上升的德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关系。

出于这个原因，关于延迟引入欧元会自动成为欧洲内部新分界线的不利方面的担忧似乎不太可能、也不合理。一个由同心圆组成的欧洲，或者欧元区出现“核心”和“外围”，这似乎并不现实，因为实现融合的真正结构性障碍至少在“核心”之内与“核心”之外一样多。分析家在许多方面对趋势的判断各不相同，但一致认为：所有选择都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即欧洲的发展是建立在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之间的平衡之上，维持法德合作是公理，但意大利属于这一重心集团也是政治现实。尽管这一主导顺序将长期处于对抗，但西班牙和波兰会紧随其后。然而，在这个核心中差异很大。与南北对抗相比，它们受到的关注较少，但它们仍然很重要，即使我们只看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差异。

当然，每个成员国都希望根据自己的经验、传统、哲学和制度采用共同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些是不同的。区外的德国和志同道合的荷兰、奥地利、芬兰或瑞典和丹麦等国的经济采用一种基于强社会协调的市场经济模式，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市场开放。相比之下，地中海成员国的机构能力和传统较少依赖增长战略的设计。应对竞争力挑战的传统和主要工具是本国货币贬值和通过汇率进行调整。与这些相比，法国本身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模式，其中国家的作用明显大于其他国家，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而不是出口（Tokarski，2019年）。（寻找马克龙的欧洲战略自治理念的起源可能并不夸张，它适应了保护欧洲作为法国内部市场的需要，并采取了环境、财政和劳动力市场保护措施以防止外部竞争，但在欧盟单一的内部市场以及相对于内部，尤其是东部竞争对手的服务竞争力方面同样如此在）。

七、解决分歧的尝试

我们已经谈到了规模的重要性。当然，每个成员国都有责任遵守共同的规则，但对整个系统违反规则的负面后果的小、中和大责任不同。然而，经验表明合规性和问责制并没有那么直接相关这一事实且没有促进这一点。值得回顾的是，用于执行对系统运作如此重要的财政规则的工具已经细化——“二号项目”¹¹，“六号项目”¹²，“财政协定”¹³——这些工具的实际使用从未实现过。更令人警醒的是，只有一个案例是真正考虑的主题，以匈牙利为例，它没有采用欧元，并且由于其规模而无法产生特殊的溢出效应，因此认真计划暂停凝聚力支持。在令人难忘的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案例中，没有一个具有实施制裁的政治权力。目前尚不清楚如何实现规则的一致执行，尤其是对于大国和强大的成员国。因此，从政治上讲，这对较小和较贫穷的国家也不起作用。

因此，如果我们不使用金融纪律来实施改革，问题仍然是如何鼓励会员国实施往往不受欢迎的改革，这些改革有望提高竞争力并确保长期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条件。这就导致了所谓的经济研讨的机构。

作为研讨的一部分，理事会应根据委员会的提议以特定多数票行事，向每个成员国提出建议，并监督其实施情况。但是，本案的做法也是自相矛盾的。自从由于容克委员会将自己定义为政治参与者并以这种方式行事而取代经合组织“交流经济政策经验和建议”的明确做法，对建议的认可越来越成为政治斗争的主题，客观的专业分析越来越多地被法治等不可估量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辩论所取代。除此之外，没有政治责任的机构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管民选政府、议会和决策者的角色，这是一个问题。选民可以求助于谁做出错误的决定？对有政治责任的政府而言，违背他们的意愿强行硬改革在委员会机构比当选的领导人更知道成员国需要什么是很困难的。这解释了为什么会员国在过去十年中仅实施了“建议”的7%¹⁴。

2020年12月就2021-2027年多年预算和7500亿欧元重建基金达成的协议是一次质的新尝试。在后者的情况下，匈牙利以及国际公众主要关注匈牙利和波兰否决的可能性。然而，其他三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其他问题已被提上议程，这对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一体化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一，由于疫情和重建基金，在可预见的未来，单独的欧元区预算问题已从议程中删除。法国和南欧国家所敦促的质的飞跃，作为补充欧元架构的一步已经落后了。二，与此同时，已经采取了一个实际原则上同样重要的步骤，但明显不是在欧元区框架内，而是在欧盟27国框架内决定发行联合债券，从而将部分债务公有化。这是在满足法国和南欧国家需求方面的突破，即使说是一次性决定，不会为未来开创先例。三，推进改革出现了特殊的新局面。新的情况是，根据疫情造成的损失计算的赠款和软贷款，因此主要集中在南欧国家，只有在受益

¹¹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3_457

¹²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MEMO_13_979

¹³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LEGISSUM%3A1403_3

¹⁴ 欧盟委员会关于学期建议实施情况的报告，2019年 <https://op.europa.eu/webpub/eca/special-reports/european-semester-16-2020/en/index.html>

成员国能够提交与分阶段实施和支付标准相关的改革计划以供批准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其实施预计将导致不需要更多外部援助的结构性改革，从而确认该计划是一次性的这一说法变得可信。该计划的准备、协调、批准，尤其是实施，将是前所未有的制度性挑战，但对所有参与者来说也是一项可信的挑战。根据商定的程序，每个项目都必须赢得委员会和其他 26 个成员国的“善意”。因此，问题将是在潜在的严重市场情况下，例如荷兰是否会延迟甚至阻止批准整个尚存的意大利计划，甚至阻止支付到期分期付款？所有这一切将如何改变，或者它能否改变长达数十年的令人不快的决定的做法，即在成员国眼中而不是在彼此眼中，而是在委员会眼中做出令人不快的决定？这个系统会产生多少压力？我们是在创建一个客观的、基于证据的系统，还是一个遵循政治或意识形态考虑的工具？这些是困难的问题，但会产生深远的后果。

八、结论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关于匈牙利加入欧元的结论？值得从三个维度寻找答案：

- 欧元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 引入欧元的后果对欧洲政策回旋余地的后果、
- 加入以直接利益可计算的优势和劣势的平衡。

自成立以来，欧元区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具备危机管理的能力，并且已经创建了必要的工具。同时，源于成员国的不同意见而产生了矛盾仍然存在，主要是在降低风险和分担风险方面。财政联盟的建立将把重要的权力从成员国的责任转移到欧盟的权限上。对此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然而，没有它，欧元区建设的未完成性质仍然存在。

没有证明欧元区是一种更高的品质，置之不理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但进入它肯定会产生积极影响。可以在外部改进结构，也可以在内部落后。不，或不主要取决于货币，创始人和新成员之间也有输家和赢家。

因此，欧元区的边界不是指欧盟内部的定性线。我们已经澄清，政治归属问题已经随着加入欧盟和北约而确定，不会产生贸易分流效应。在更广泛的欧洲政治背景下，问题更多是关于我们希望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或五十年后看到什么样的使我们感到舒适的欧洲。简而言之：“基于强大成员国的强大欧洲”或联邦架构，其中成员国的大部分能力是通过共同机构行使的。从匈牙利的角度来看，即使没有回答这个深刻的政治问题，共同货币似乎也没有单一内部市场的完整性和竞争中重要，在那里凝聚力政策促进融合，不那么主导的国家和公司受到强大竞争的保护规则，并且执法的公平性不会被制度、政治和/或自身利益扭曲。

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对于创始人和后来的进入者来说，收益不是自动的，除了较低的回报之外。在创始国和后来加入国的情况下，也有在发展水平上落后和追赶的例子，而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也可以这确定。一个国家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的“可改革性”似乎更为重要。曾有改革尝试遇到阻力的情况，但也有实例——2000 年之交和 2010 年以后的德国，或 2010 年

之前的拉脱维亚——在某些国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可能进行实质性改革。无论如何，转型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考虑决策自由的后果是合理的，这最终一方面是主权，另一方面是制度问题。一方面是真实，欧元成员资格为参与决策开辟了新的机会，因为有关欧元的决策是——并且可以理解的——由参与者自己做出。这对所涉的决定增加影响。俗话说，我们不能成为受害者，而是影响我们的决定的塑造者。另一方面，与此同时，我们然而失去执行自己的货币政策的机会，据我们所知和判断，这最符合我们自己的经济目标和情况。单一的货币政策必须同时兼顾南北和东西方的观点。这也表明，当可以充分肯定地假设不再存在追赶和降低竞争力等特定方面来证明甚至需要货币政策自主权时，就必要并值得考虑引入单一货币。

因此，教训和结论并不明确。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阐明追赶国家的趋同过程需要汇率调整的假设的有效性，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假设，可能会产生其他负面后果，例如外贸平衡恶化、经济下滑、失业。或者，相反，需要固定汇率来提供进行必要的结构性变革以增加价值所需的规范性竞争压力。保加利亚和波罗的海国家使用“货币发行局”（currency board）亦即固定的欧元汇率的经验是值得研究的。

经验表明，如果国家不适应挑战，外部结构变革可能会取得成功，但可能会落后。欧元会员资格对于遇到大困难的弱势群体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好处。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在正常周期中，非常强大和有竞争力的人可以从欧元中获得额外的资源，而脆弱性很容易导致损失。

这取决于价值选择、自信和对不同风险的认知。就我而言，以下“姿势”似乎是最有同情心的。

让我们不要将欧元的引入视为我们调整愿景的固定点，而是让我们塑造我们的愿景，应研究一下欧元的引入如何适应它。我想我们会看到，对于一个宜居的好国家，我们需要为改变成功因素的变化做好准备。这需要对人力资源、物理基础设施和整个经济结构进行微调，以应对技术和其他挑战。这将使一个国家具有竞争力。我们应评估一下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间需要。但与此同时，让我们也意识到，在 2008-2009 年或现在疫情期间袭击世界的冲击不会消失。我们不能现实地依赖十到十五年以上的无危机时期。在危机时期，我们可能需要一个久经考验的保护伞来管理危机和降低收益率，欧元可能意味着这一点。但也让我们意识到，欧元的引入不仅是一个保护伞，也导致一个国家回旋余地的缩小。因此，这个问题可以表述如下：我们是否更有信心，与作为多利益相关方系统的一部分相比，我们可以更好、更快地自行管理必要的变更。而且，时间很重要。如果我们能迅速减少我们的外部漏洞，成功前景的机会就会更高，如果不能，一个具有更高安全性的共同掩护会更好。简单地说，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能够坚定而持续地降低债务水平，同时进行提高竞争力所需的结构性改革，那么等待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确定性随着引入而减少是值得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现实的目标，应尽快设定一个加入的目标日期，并将其视为能让我们尽快到达无风港口的指南针。虽然一种选择似乎更容易，但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更具挑战性的第一种方式更为安全。

参考文献

- Acocella, N. (2020): *The European Monetary Union – Europe at the Crossroads*. (《欧洲货币联盟——处于十字路口的欧洲》)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9781108892858>
- Alcidi, C. – Ferrer, J.N. – Di Salvo, M. – Musmeci, R. – Pilati, M. (2018): *Income convergence in the EU: A tale of two speeds*. (《欧盟的收入趋同：两种速度的故事》) Commentary, CEPS. <https://www.ceps.eu/wp-content/uploads/2018/01/ConvergencePDF.pdf>. 下载日期：2021年5月5日
- Bongardt, A - Hefeker, C. – Hermann, C. – Torres, F. – Wunsch, P. (2013): *Convergence in the EU*. (《欧盟趋同》) *Intereconomics, Review of European Economic Policy*, 48(2): 72–92. <https://doi.org/10.1007/s10272-013-0448-9>
- Bordo, M. – Jonung, L. (1997): *The history of monetary regimes – some lessons for Sweden and the EMU*. (《货币制度的历史——瑞典和欧洲货币联盟的一些教训》) *Swedish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997/4: 285–358. <https://www.government.se/contentassets/04510354cfc64675bb7ac0557c26374f/michael-d.-bordo--lars-jonung-the-history-of-monetary-regimes---some-lessons-for-sweden-and-the-emu>. 下载日期：2021年5月5日
- ECB (2020): *Convergence Report*. (《融合报告》) European Central Bank. <https://www.ecb.europa.eu/pub/convergence/html/ecb.cr202006~9fefc8d4c0.en.html>. 下载日期：2021年5月5日
- Erhart, S. (2021): *Ready or not? Constructing the Monetary Union Readiness Index*. (《准备好了还是没有？构建货币联盟准备指数》) JRC Technical Report,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4d08a9bf-6504-11eb-aeb5-01aa75ed71a1>. 下载日期：2021年5月5日
- Franks, J.R. – Barkbu, B.B. – Blavy, R. – Oman, W. – Schoelermann, H. (2018): *Economic Convergence in the Euro Area: Coming Together or Drifting Apart?* (《欧元区经济趋同：融合还是渐行渐远？》) IMF Working paper, WP/18/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https://doi.org/10.5089/9781484338490.001>
- HCSO (2020): *Helyzetkép a külkereskedelemről, 2019*. (《2019年外贸形势》), Hungarian 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 <https://www.ksh.hu/docs/hun/xftp/idoszaki/kulker/2019/index.html>. 匈牙利中央统计局，下载日期：2021年5月5日
- Tokarski, P. (2019): *Divergence and Diversity in the Euro Area – The Case of Germany, France and Italy*. (《欧元区的分歧和多样性 -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案例》) SWP Research Paper 2019/RP 06,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https://doi.org/10.18449/2019RP06>
- Virág, B. (ed.) (2020): *Fenntartható felzárkózás euróval. Hogyan újítsuk meg a maastrichti kritériumokat?* (《可持续追赶欧元——如何更新马斯特里赫特标准？》), 匈牙利国家银行